

新诗

2009年 第2辑
NEW POETRY REVIEW

评论

总第十辑

问题与事件

中国现代诗人与诺斯替、喀巴拉、浪漫主义、布鲁姆

——谈帕特里卡·劳伦斯著《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

并回应王敦《怎样给奔跑中的诗人们对表：关于诗歌史的问题与主义》一文 西川

骆一禾研究专辑

“与一切而至万灵……”

——骆一禾《世界的血》、《大海》试论 西渡

在山巅上万物尽收眼底

——重读骆一禾的诗论 姜涛

观察与言论

当代中国基督教诗歌及其思想史脉络 周伟驰

诗人研究

从政治的诗学到诗学的政治（续）

——北岛论 吴晓东

论下之琳抗战前期的旅程与文学 王璞

海子：胡汉合流的民族诗学 秦晓宇

访谈

“我坚定地相信诗本身的独立存在”

——孙绍振访谈录 伍明春

“诗人更需要有对语言的责任”

——顾彬访谈录 马铃蓂兄弟

翻译与接受

“隙缝之玫瑰”

——伽达默尔论策兰（德） 伽达默尔著 王家新等译

利维斯的诗歌批评 王飞

本辑作者简介

编后记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年 第2辑
NEW POETRY REVIEW

新诗评论



总第十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诗评论. 2009年第2辑(总第十辑)/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301-16376-4

I. 新… II. 北… III. 新诗—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6466号

书 名:《新诗评论》2009年第2辑(总第十辑)

主 编:谢冕 孙玉石 洪子诚

本 辑 编 辑:冷 霜

责 任 编 辑:张雅秋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6376-4/1·2183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szw@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8印张 260千字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问题与事件

中国现代诗人与诺斯替、喀巴拉、浪漫主义、布鲁姆

- 读帕特丽卡·劳伦斯著《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并回应
王敖《怎样给奔跑中的诗人们对表：关于诗歌史的问题与主义》一文 ……
…………… 西 川 (3)

骆一禾研究专辑

“与一切而至万灵……”

- 骆一禾《世界的血》、《大海》试论 …… 西 渡 (27)
在山巅上万物尽收眼底
——重读骆一禾的诗论 …… 姜 涛 (57)

观察与言论

当代中国基督教诗歌及其思想史脉络 …… 周伟驰 (69)

诗人研究

从政治的诗学到诗学的政治(续)

- 北岛论 …… 吴晓东 (111)
论卞之琳抗战前期的旅程与文学 …… 王 璞 (127)
海子：胡汉合流的民族诗学 …… 秦晓宇 (162)

访 谈

“我坚定地相信诗本身的独立存在”

- 孙绍振访谈录 …… 伍明春 (195)
“诗人更需要有对语言的责任”

——顾彬访谈录 马铃薯兄弟(210)

翻译与接受

“隙缝之玫瑰”

——伽达默尔论策兰 [德]伽达默尔著 王家新等译(235)

利维斯的诗歌批评 王 飞(256)

本辑作者简介 (282)

编后记 (284)

问题与事件

西 川：中国现代诗人与诺斯替、喀巴拉、浪漫主义、布鲁姆

——读帕特丽卡·劳伦斯著《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并回应王敖《怎样给奔跑中的诗人们对表：关于诗歌史的问题与主义》一文

中国现代诗人与诺斯替、喀巴拉、浪漫主义、 布鲁姆

——读帕特丽卡·劳伦斯著《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
并回应王敖《怎样给奔跑中的诗人们对表：
关于诗歌史的问题与主义》一文

西 川

—

许多年前在一份名为《讽刺与幽默》的漫画报纸上看到过一小组漫画(两幅或者三幅。作者的名字忘记了):左右两个玻璃鱼缸。两个鱼缸里各有一条水中的金鱼。或者由于爱,或者由于恨,它们相互瞪视着。忽然,两条金鱼不约而同地跃出各自的鱼缸,投入对方的鱼缸。结果,左鱼缸的金鱼跳进了右鱼缸,右鱼缸的金鱼跳进了左鱼缸,命运让它们依然相互瞪视。这一小组漫画可以被视为一个有关“换位”的寓言。

在阅读美国学者帕特丽卡·劳伦斯著《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以下简称《中国眼睛》)这本书时,我脑子里就闪现出上述漫画。丽莉·布瑞斯珂是20世纪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小说《到灯塔去》中的女画家。伍尔芙赋予了布瑞斯珂一双中国人的观察世界的眼睛。帕特丽卡·劳伦斯以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为隐喻,以中国女作家凌叔华与英国人朱利安·贝尔的恋情交往为主线,讲述并讨论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新月派团体与

英国伦敦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之间的文化、文学互动。这种互动对强化英国文人的中国式审美和中国文人对现代主义文学意识的获取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这算不上是全然的文化换位,甚至可以说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各自深化了自己的文化思考,但这种思考中包含了文化换位的因素,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劳伦斯力图揭示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多种话语和形式,并把中国和中国美学纳入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体系,以期重建世界性的现代主义。^①在此基础上,作者扩展了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并通过这样的叙述,挑战了昌德拉·莫汉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有关后殖民主义的某些观点和立场,例如“贱民不能说话”。^②

书中不可避免地谈到徐志摩与他在剑桥的老师 G. L. 狄更生的关系。狄更生多愁善感,钟情于浪漫主义文学。伍尔芙曾经嘲讽过他:“歌德、雪莱、歌德、雪莱,然后他就找不到眼镜了。”^③他曾在 1910—1911 年和 1913—1914 年两次来华。他痴迷于中国文化,赞扬中国人是一个文明的民族,认为自己前世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人。他曾模仿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写过一本书,名为《中国人约翰的来信》。他与多愁善感的徐志摩可以说一拍即合——除了在性取向上:狄更生是个同性恋。对于徐志摩热爱浪漫主义文学这一点,我们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不仅仅是徐志摩,当时很多文学青年似乎都沉浸在对浪漫生活情调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小资向往之中。在《中国眼睛》一书中作者劳伦斯提到,1936 年正任教于武汉大学,并与凌叔华陷入情感纠缠的朱利安·贝尔曾经写信给他身在英国的母亲瓦内萨,信中写道:“我正进行一场反感伤主义的战斗——中国人不能理解‘现代主义’,但他们却欣然接受浪漫主义最糟糕的作品,像沉溺于杜松子酒的黑鬼,这就是仅仅依靠敏感生存的下场。”^④我在《诗人观念与诗歌观念的历史性落

① 帕特里卡·劳伦斯著:《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② 同上书,第382—383页。

③ 同上书,第209页。

④ 同上书,第89页。

差》(以下简称《落差》)一文中所说“中国人在20世纪初假扮19世纪的人”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看来我有些疏忽:我应该在“19世纪的人”前面加上一个定语——“欧洲”。中国人(在此专指中国文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曾假扮过19世纪的阿拉伯人或印度人或非洲人,这意味着“假扮”出于一种向往,不仅仅是文学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甚至是气质性的。向往什么呢?当然是以欧洲——或扩大一些: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这是当时人们感受时代精神、自动对表的结果。但饶有趣味的是,20世纪初的许多中国文人并没有把表对到欧洲的20世纪初(或者18世纪、17世纪),而是对到了欧洲的40年或者80年前。这里面透露出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处境落差值得我们深思。

美国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注意到了中国人——或者在更广阔的说:亚洲人——对浪漫主义的误读接受。他说:“浪漫主义诗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新的主题、新的写作模式,以及全新的关于诗是什么的概念。然而浪漫主义诗歌的引入通常是通过翻译,或者通过对原诗语言并不成熟的把握。因此,当其进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们往往对其背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重量所知甚微。浪漫主义诗歌成为游离于历史之外,奇迹般的全新事物——这正契合了浪漫主义诗歌自己营造的谎言。凡是熟知英语诗歌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神话,但是对外人来说,他们相信浪漫主义诗歌关于‘全新’的宣言,这宣言带给他们一线希望——也许,可以逃离似乎已经失败了的历史。”宇文所安这段话出现在他“著名的”文章《什么是世界诗歌》中,发表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上。该文原本只是一篇书评,所评对象为北岛的诗歌英译本《八月的梦游者》。该文首发于1990年11月19号的美国《新共和》杂志,其后《今天》杂志曾组织多人针对这篇文章发表过不同的看法。时隔十余年之后《新诗评论》再予发表,说明该杂志的编辑们十分看重这篇文章。宇文所安的观点中确有可商榷之处:中国人需要浪漫主义,同时误读浪漫主义有其历史的需要,这与中国的现实有关。当然这不能成为我们为“经过双重翻译的英文诗歌”(宇文所安语,指中文当代诗中的一部分)质量低下做辩护的理由。上引宇文所安这段话我在王敖的论文《怎样给

奔跑中的诗人对表:关于诗歌史的问题与主义》(以下简称《对表》)中又重新读到。作为一个耶鲁大学出来的中国学生,王敖诚恳地、绝无其他心思地称赞宇文所安提供的视角“富有启发性”,但认为这并不是“我们研究浪漫主义的唯一途径”——这话当然是对的。王敖以全世界的(主要是美国的)被他和他的英语系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冠以“浪漫主义”之名的现代诗歌为讨论对象(可能其中也包括了中国人的“浪漫主义”),告诉我们为什么说浪漫主义是一种伟大的主义:“浪漫主义诗歌所提出的关于自我,世界,自然和想象力的基本设想,仍然代表了现代世界中关于诗歌的最强大的话语。它所制造的超越时间的神话,来自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唯心论,而它所提供的隐喻仍然具有在不同的文化中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活力。另一方面,这种唯心论在现代世界里跟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密切的联系。”^①我补充王敖一句:唯心主义并不能由浪漫主义所独享。

回到宇文所安的观点并正面理解其意涵,我感到顺理成章的结论恐怕就是这世界上的浪漫主义(复数)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同。帕特丽卡·劳伦斯在《中国眼睛》一书中分析了徐志摩时代中国式浪漫主义的特征:“他们的浪漫主义明显带有这个时期中国的特征,除了在现代主义文学体系里有所参照外,与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大相径庭。当时,那些曾经留英的中国文人墨客深受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个性、人生及诗作的影响,他们把英国浪漫主义精神和哲学带回到了中国,在中国文化发生巨变的时期,他们以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一种变革的精神记录了不同思想体系的碰撞以及人性的表达。英国浪漫主义强调想象力的作用,而这一点并没有激发中国作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突出个性、突出反抗精神的个性化的浪漫主义。”^②这段话对我有所启发,使我意识到我可能有必要修正一下我对中国20世纪初浪漫主义诗歌与诗人的认识。按照劳伦斯的意思,中国人的浪漫主义集中在了“自我”的表达上,而对想象力的发展投入有限,其原因何

^① 《新诗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辑。

^② 同上书,第165页。

在？在《中国眼睛》的另一处，劳伦斯谈到：“中国人之所以为浪漫主义所吸引，可能是因为他们偏爱此类主题中的人物往往不以通常形象出现，还可能是因为他们偏爱浪漫主义诗歌以及绘画中所描述的风景。他们也欣赏自我表达、主观表述，以及诗歌的坦白特性。但是，尽管他们更欣赏英国浪漫主义的这些方面，却忽略了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思想的变革性力量。”^①如果思想的变革力量被忽略了，那么浪漫主义在中国便成为诗人自我形象塑造的工具。对比劳伦斯和宇文所安的观点，我们发现，两人其实触及了相似的问题，但劳伦斯强调中国所谓“浪漫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变异，而宇文所安质疑这种变异的价值并暗地里期待一种富于“中国特性”的当代诗歌。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屡次谈及徐志摩的浪漫主义，在《落差》一文中尤其谈到徐志摩（另一位是郭沫若）。站在今天，也就是从1970年代后期到今天的、积累了三十多年中国诗人接受、思考、比对和写作经验的今天的角度，我感到有必要重新审视徐志摩等人在20世纪初回到欧洲（特别是英国）19世纪文学感受和表达方式的努力。徐志摩等人在诗歌写作和诗人形象的自我塑造方面，一直影响到今天老老小小的左、中、右诗人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诗人们以及广大懵懵懂懂的诗歌读者们。这种影响的结果在当下中国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活环境中，有时显得可笑，有时显得极其可笑。而且这种影响如今开始像头发丝一样分叉——毕竟，30年来中国诗人们已在诗歌语言、风格、方法、观念等方面变得见多识广，但另一方面，诗人们和诗歌读者们对诗人形象的印象似乎鲜有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对诗歌观念与诗人形象的理解上的落差。如今，这种落差已经妨碍到我们的工作，妨碍到大学和社会对于诗人工作的理解和接受。于是我感到我们有必要回头探讨这种落差形成的历史状况，这样，我们当然会自然而然地把问题追溯到徐志摩这里。但王敖的《对表》一文心思不在诗歌写作和诗人形象的落差上，而是在浪漫主义在20世纪西方（美英）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上。这本来是另一个问题，但因为问题有趣，我姑且试

^① 帕特丽卡·劳伦斯著：《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2008年，第87页。

做回应。长期以来,无论是以英国 19 世纪文学为坐标,还是以中国古代诗歌为坐标,徐志摩和他的浪漫主义都被大大高估了。一个文学青年的浪漫主义在文学本身的意义上本来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当它变成了一种文化现实之后,它牵带出来的问题却是我们无法绕过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徐志摩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徐志摩的浪漫主义”或“中国文学青年的浪漫主义”的问题。驱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是我们立足于中国文化现状的现实感和我们对如何展开我们的文化创造力的关切,而不是戴着“学理”高帽的大学课堂笔记外加才子脾气的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但在这里,我要对徐志摩及其影响作一点儿观点上的补充:将徐志摩放置在中国 20 世纪的大历史之中,我们会发现,以徐志摩为代表人物之一的中国变种浪漫主义文学其实也是中国现代进程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我读《中国眼睛》之后获得的感想。我这样说并不代表我对徐志摩诗歌成就的看法有变,我只是想在充分考虑其历史价值的情况下,把话说得更明确和更全面一些。关于徐志摩的话题到此为止。

二

在我的《落差》一文于《今天》2008 年春季号(总第 80 期)发表之后,身在美国的王敖写了一篇名为《怎样给奔跑中的诗人们对表:关于诗歌史的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在该文于《新诗评论》发表之前,它被隆重贴在了由臧棣、孙文波掌舵的“文学自由谈”网上。臧棣称赞该文“肯定是 2008 年度最重要的诗歌理论文章!!!再说一句:这是改革开放以后近 30 年来最好的诗歌批评文章。在(再)撂一句:这是有中国

新诗以来最好的批评文章。”^①语气如此之重超过了给哥们捧场的意思,这等于命令我要认真阅读该文章。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旁征博引,有纵横捭阖之态,像“自家人儿”对“自家人儿”似的大量引述美国文学理论家、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和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约翰·阿什伯莱等人的观点和作品,勾勒出浪漫主义在20世纪英语诗歌界的存在和发展,让我们看到了浪漫主义强大的生长和变异能力,对我们了解美国大学(尤其是耶鲁大学)里的一部分诗歌观点甚有好处,让我们见识了美国大学英语系诗歌教学的深度、广度和偏见。所谓“偏见”也许是故意弄出来的:好像现代主义文学在这个世界上从未发生过!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2002年秋天耶鲁大学的 Trumbull 学院曾为我举行过一次座谈会,会上我对在座的人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诚地建议大家阅读庞德。”尽管庞德的手稿存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里,但耶鲁英文系的诗歌趣味却堪称保守。王敖文章以耶鲁英文系的趣味或哈罗德·布鲁姆的趣味顺带手地贬损了一通被美国学者约翰·提泰尔(John Tytell)称作“孤独的火山”的埃兹拉·庞德。其实该文中只有很少几句话涉及我,虽有讽刺挖苦之意,但这并不重要。不过,看得出来,是我的文章刺激了王敖写出他的《对表》一文。文章并没有回护徐志摩和郭沫若,不过却在后四分之一处赞扬了郭小川的“帝国想象”。文章主要叙述或曰耙梳的是“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美国所取得的崭新成就,这和我在《落差》中讨论20世纪初中国诗人如何自我浪漫主义化没什么关系,因为中国诗人,无论是在80年前还是在20年前还是在今天,所受到的浪漫主义影响都主要来自西方19世纪(北大诗坛除外)。一般说来,中国人阅读史蒂文斯和阿什伯莱也不是在浪漫主义的意义上。也许这正说明了中国诗歌读者在阅读上的肤浅,但

① 王敖在文中对臧棣的赞扬是:“臧棣近年来的‘丛书系列’和‘协会系列’,从诗歌观念上讲,是一种对浪漫派的‘大诗’和‘自我’的改造。史蒂文斯曾把雪莱的‘大诗’转写成自己的‘风琴全书’(他为自己的诗合集设计的题目),臧棣则内化了佩索阿的做法,在复调的丛书和复数的自我之间建立新的即兴与对位的关系。在他的笔下,浪漫派关于诗歌本质的追问,有可能被转化为怎么为新诗发明新品种的行动,对诗歌想象力本身进行再想象,也有望成为新的文化建构的驱动力。”

深化我们的阅读却是另一个问题。我在阅读王敖《对表》时觉得有必要写下这篇文章的原因,恰恰在于我关心他那主要承袭自哈罗德·布鲁姆的有关浪漫主义的表述。

《对表》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布鲁姆。我们作为不同文化的读者(如果不涉及第一世界阅读、第二世界阅读、第三世界阅读的区别)对西方人的论断,其实不必亦步亦趋,印度思想家阿什斯·南地曾经说过,我们当然有权利也有理由可以认为克尔凯郭尔是比黑格尔更伟大的哲学家。^①布鲁姆作为美国的右派文化理论家(他自称左派),以维护西方正典、西方文明为己任(他自己说“捍卫西方经典绝非要维护西方,也不是一项民族主义的事业”)^②,斥责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西方的种种左派文化理论如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为“憎恨学派”^③。我本人对布鲁姆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广阔阅读、论说力道和论说激情十分敬佩,并且认为当代中国学界对西方左派理论的译介规模大大超过了对右派理论的译介,以致我们过于缺乏在文化守成方面的理论支持。布鲁姆的某些观点甚合我意(如儿子生出父亲;如他反对福柯、巴特等人所说的作者死亡)。他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而言肯定是重要的。近年来中国已经翻译出版了他的几本书:《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三联)、《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中国社科)。虽然他还有不少重要著作尚未翻译(例如 *The Book of J, 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但我们从已翻成中文的这几本书,依然可以大致了解他的文学、文化观点和主张。不过布鲁姆虽然重要,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被布鲁姆低看的人就一定要为我所低看。在美国,哈罗德·布鲁姆和海伦·文德勒这两位文学理论巨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学院派诗歌批评的趣味。他们看中的19和20世纪英语诗人主要是布莱克、华兹华

^① *Talking India: Ashis Nandy in Conversation with Ramin Jahanbegloo*. Oxford, New Delhi, 2006, pp. 74-75.

^②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An Elegy for the Canon*,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p. 40.

^③ *Ibid.*, p. 20.

斯、雪莱、济慈、丁尼生、勃朗宁、惠特曼、狄金生、叶芝、奥登、哈特·克莱恩、史蒂文斯、毕晓普、阿什伯莱、希尼等。^① 他们可以接受 T. S. 艾略特,但对庞德和庞德一系的诗人不能接受。所以当休·肯纳(Hugh Kenner)在1971年出版《庞德时代》(*The Pound Era*),他们自然是不以为然的。他们觉得所谓的“庞德时代”应该被称做“史蒂文斯时代”。另一位重要的美国批评家玛卓瑞·坡劳夫(Marjorie Perloff)为此专门写过一本书《智力舞蹈——庞德/史蒂文斯:谁的时代?》(*The Dance of the Intellect—Pound/Stevens: Whose Era?*)。玛卓瑞认为,庞德、史蒂文斯、T. S. 艾略特和 W. C. 威廉斯在20世纪的美国诗坛构成一个四角关系:庞德的左边是威廉斯,右边是艾略特;史蒂文斯的左边是艾略特,右边是威廉斯;庞德可以接受威廉斯和艾略特,史蒂文斯可以接受艾略特和威廉斯,但庞德和史蒂文斯两人之间属于对峙关系。王敖在他的《对表》中一边倒地引介布鲁姆,而对坡劳夫和休·肯纳只是一笔带过,给不明美国诗歌政治的人造成一个假象,好像现代主义已经没人提了,浪漫主义正在获得新生并且具有压倒性的势力。王敖对庞德本人的布鲁姆式的蔑视态度也十分有趣。他提到庞德的法西斯主义,但对庞德的法西斯主义持极端批判态度的美国语言派诗人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他的文章《痛击法西斯主义》被附录在黄运特译《比萨诗章》的后面)恰恰非常喜欢庞德的诗歌。有一本小书,名叫《诗人的书架》(*Poet's Bookshelf: Contemporary Poets On Books That Shaped Their Arts*),编者彼得·戴维斯(Peter Davis),从这本小书可以看出,庞德对许多美国当代诗人来说极为重要,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庞德的《诗章》是许多诗人的案头书。

哈罗德·布鲁姆重新阐释浪漫主义,视浪漫主义为一种超时代的艺术潮流。在《幻象集成——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解读》一书的前言《普罗米修斯的复兴:浪漫主义诗歌产生的背景》一文中,布鲁姆指出:

^① 参见布鲁姆 Harold Bloom: *Genius: 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 Warner Books 和文德勒 Helen Vendler: *The Music of What Happens: Poems, Poets, Critics*. Harvard.

“‘浪漫主义’这个便利的术语描述的文学时期正好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以及后来的卡斯尔雷(Castlereagh)和梅特涅(Metternich)时代同时。不过,直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文学史家们回顾19世纪初期的文学运动时,才使用了这一术语。自那以后,这个词就不仅意指着那个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文化,而且还意指着一种无时间性的和反复出现的艺术潮流,且常常被看作是所谓的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艺术相对立的艺术形式。”^①这一见解同宇文所安对亚洲国家接受浪漫主义的看法相左,同时被王敖全盘接受,并作为出发点呈现在他的文章中。而关于布鲁姆阐述浪漫主义的理论来源,王敖说得也正确(虽然并不全面):诺斯替教派、犹太教喀巴拉主义。身为犹太人的布鲁姆在1970年代专门写过一本书:《喀巴拉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对其理论来源,布鲁姆自己的说法是:“这些东西(天使血、梦中的准预言性因素、‘濒死经验’和千禧年的来临)的混合早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之前就发生了,甚至可以把它追溯到古代的波斯和巴勒斯坦、中古的阿拉伯半岛、普罗旺斯和西班牙。我已经吸收了基督教的诺斯替主义、穆斯林什叶派的泛神论神秘主义和犹太教的喀巴拉主义,将它们作为我的解释的源泉,因为它们全都能为天使、梦、来世的历程或魂魄的表现形式以及弥赛亚的期待之间的联系提供强有力的解释。”^②

但诺斯替是什么?喀巴拉是什么?王敖没有说,好像中国读者肯定知道它们是什么。或者他认为中国读者无需在诺斯替和喀巴拉与布鲁姆的浪漫主义之间寻找逻辑关联,或者他自己也不甚清楚何谓诺斯替与喀巴拉。由于陌生,诺斯替与喀巴拉成了吓唬中国人的东西。我最早是在1980年代阅读博尔赫斯(非浪漫主义者)时接触到诺斯替(Gnostics,又译灵知派或灵知主义)这个概念的。诺斯替主义所追求的“诺斯”,即知识,是一种特殊的知识,是不同于理论的,能改变精神状态的灵性知识。在20世纪的西方,在一些哲学家、宗教人士、文学家那

^① 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② 同上书,第148页。